

中央研究院叢書

傳統市鎮與區域發展

明清太湖以東地區為例，1551-1861

范毅軍◎著



廣州市鎮與區域發展

廣州市鎮與區域發展委員會編

1985年



傳統市鎮與區域發展

——明清太湖以東地區為例，1551-1861

范毅軍◎著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公司

序 言

本書寫作構想直接源自筆者1992年底博士論文殺青時所獲致的一些見解，間接則受1970年代後期初踏入史學研究領域為學徒時的領會所啟發。個人歷年的研究工作表面上雖未達到環環相扣的程度，但關心的主旨卻始終如一，都以近代通商口岸開放以後，傳統社會所面臨的一大變局為依歸。無論其事涉一般國計與民生或進而影響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展，問題均化約成傳統中國社會基本經濟結構與功能的變與不變這一面向，作為探索的起點，期能對傳統中國過渡到現代的歷程及其意義有所認識並做適當的詮釋。

經濟結構與功能牽涉範圍廣泛，從土地利用、租佃制度、商品流通、市場結構、商業組織與商業倫理到貨幣的使用等均屬之。筆者在初窺歷史堂奧時，即專對中國國內區域間的貿易流通深感興趣，並遍讀近代海關總稅務司署所編製的海關年報與海關十年報告、特別報告等。由於近代海關總稅務司署及其轄下各口岸管理機構從設立初始到相當一段歲月，均由西人所主持，傳統與國內貿易流通有關之事務，國人往往習焉不察，而疏於記載，但在西人眼中卻是焦點所在，因而留下許多西文的紀錄。而尤其特殊者，則是近代海關除逐年系統性編製通商各口岸對國外的貿易流通數據外，同時亦編列國內埠際的貿易統計，特別是開港初期，商品流通數據以外，通商各港的海關年報多搭配與本口岸腹地有關的社會經濟調查報告，在近代國內區域之間的商品往來得以系統量化之餘，再輔以文字說明，因得以比較精準的了解國內當時貿易流通的趨向與本質。

近代口岸開放初期，國內區間的商品往來，自不免仍富有濃厚的傳統

色彩，隨西力介入日深則日淡，是傳統經濟體制開始經歷一大變局。欲更深入了解此一變化，則不能不上溯明清，對傳統時期國內商品的流通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筆者博士論文因此以之為專攻，完成“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的寫作。全文綜合明清傳統常關的設置、分布與課稅諸要素，在一個明清全國性的商路網絡中，歸納出今日蘇南即傳統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正是國內大宗商品輻輳之地。換言之，推動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蘇南實發揮關鍵的作用。基於這項認知，想對當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近年來乃有一系列論文的寫作與發表。本書則是承其後之作。

其實包括蘇南在內的整個江南地區，向來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家勤於耕耘之所。自1950年代以來，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開始蔚為顯學。歷來研究成果連篇累牘。僅以後起之明清江南市鎮為主題的研究而言，其雖盛起於1980年代，但迄今累計亦已達數百篇以上論文及數本專書。筆者竟不揣淺陋，不但繼續選擇江南地區做為探索的舞台，且聚焦於蘇南的市鎮，主要有見於傳統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尚有可以推陳出新之處。要言之，筆者力求對市鎮各種屬性可全面量化分析為能事。此外則側重從空間位置的角度來探索市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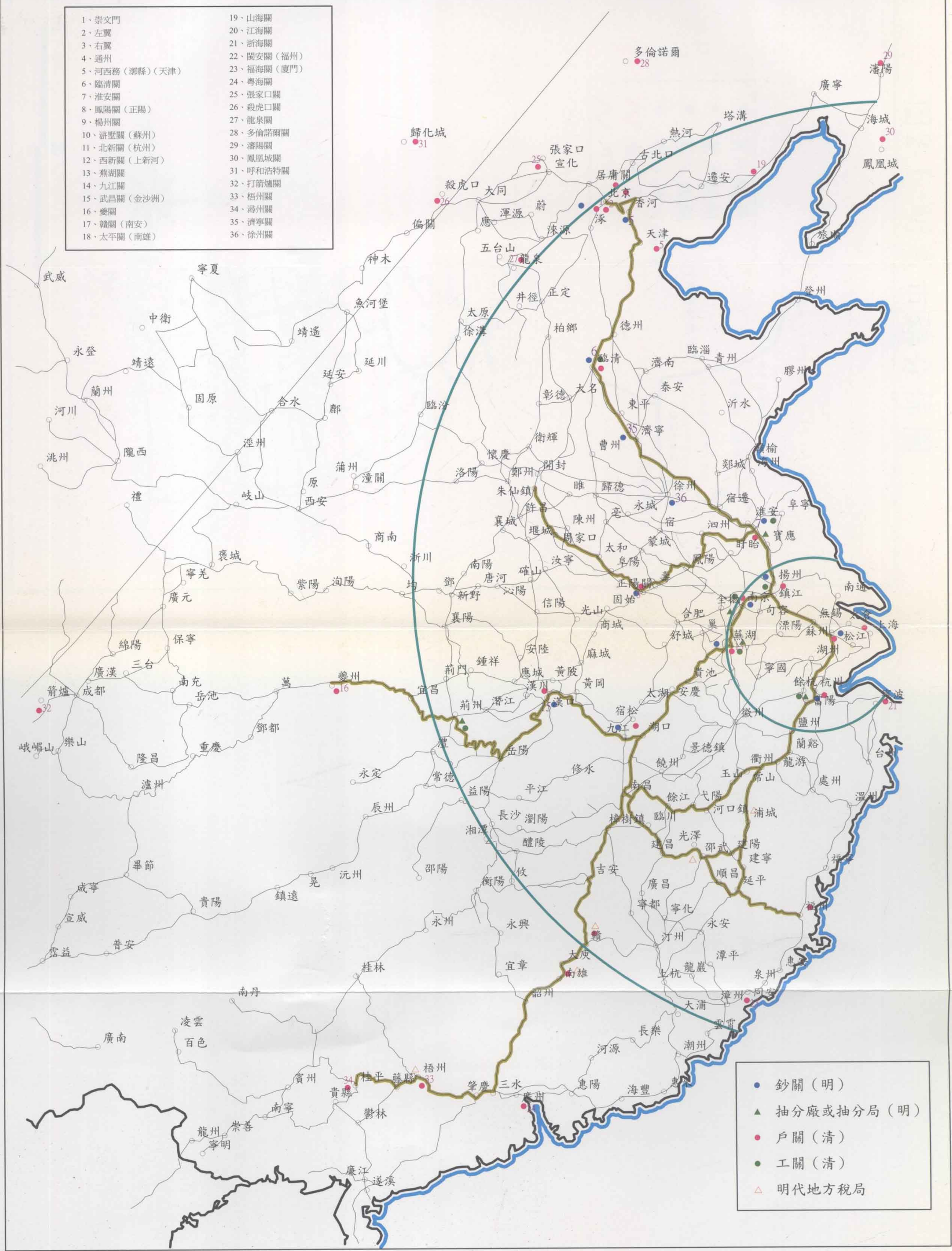
由於是既有工作的延續，本書有關市鎮分類的方式、各個市鎮等級決定的原因等，有些在其他已發表的著作中有說明與分析者，就不再一一註明以免累贅。

最後尚有一點須申明者，本書雖注重不同市鎮的等級分類及其空間分布的關係，但現有史料也只能用來探索市鎮可能的大小及其正確的地理位置而已，尚不足以就功能的角度說明鎮與鎮之間實際互動的關連性。換言之，單憑現有史料，並不能從空間上斷定各個市鎮之間等級結構的關係。既然如此，對既有的各種空間分析的模式，特別如被G. William Skinner廣泛應用來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基本結構的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及其影響頗為深遠的各種議論，就無從驗證其有效性。因此，本書無意在理論上有所發揮。現階段的研究，一切仍以史料考訂與實證分析為重，待

未來史料蒐羅更爲齊全或醞釀出更適切的方法可資運用時，自不會迴避理論方面的討論。

范毅軍

圖1-1 明清時期全國與蘇南地區重要的商路



資料來源：
 Fun, I-Chun, Long 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2

圖2-1 明中葉（1550年止）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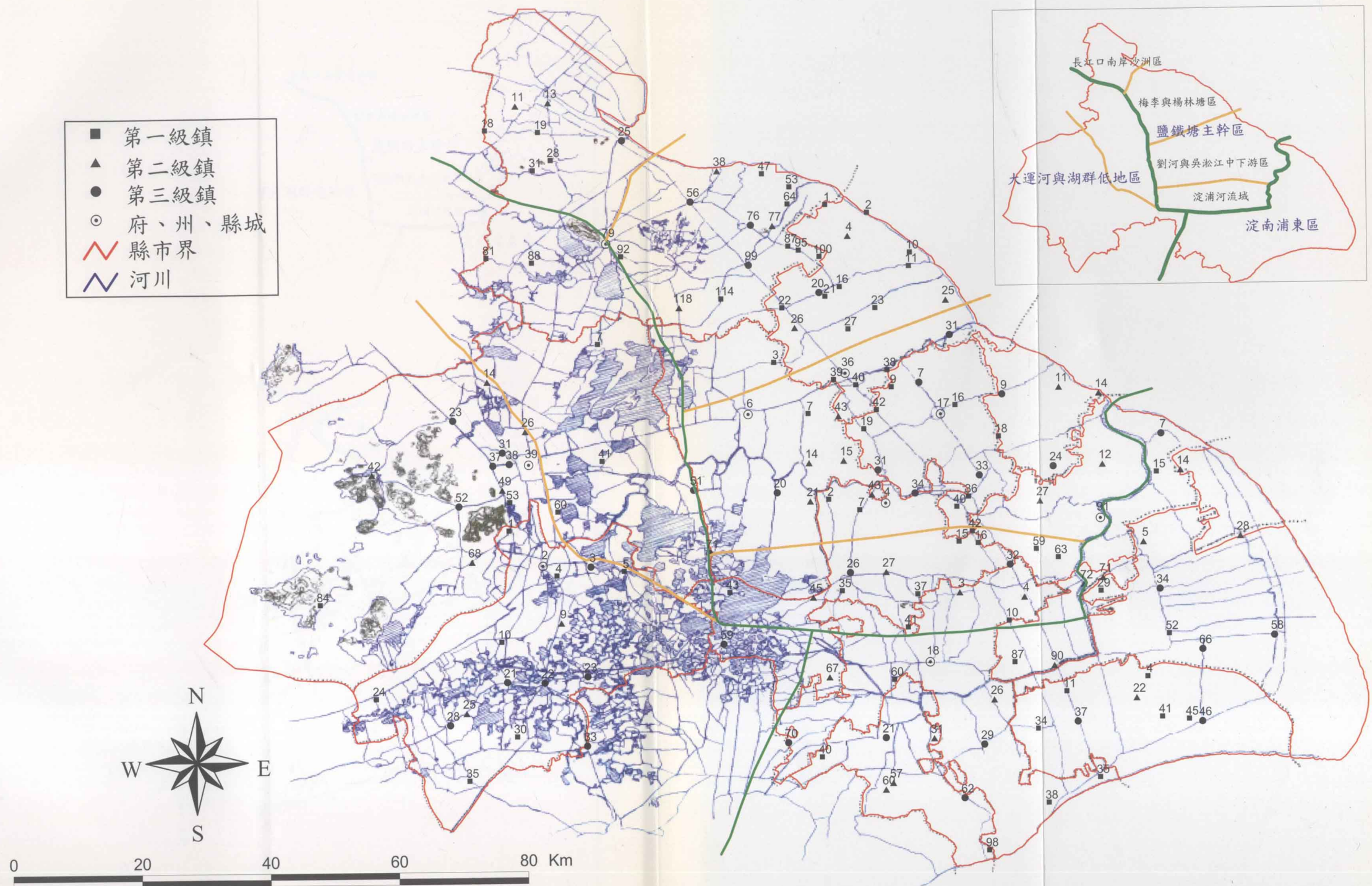


圖2-2 明中葉以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1551-1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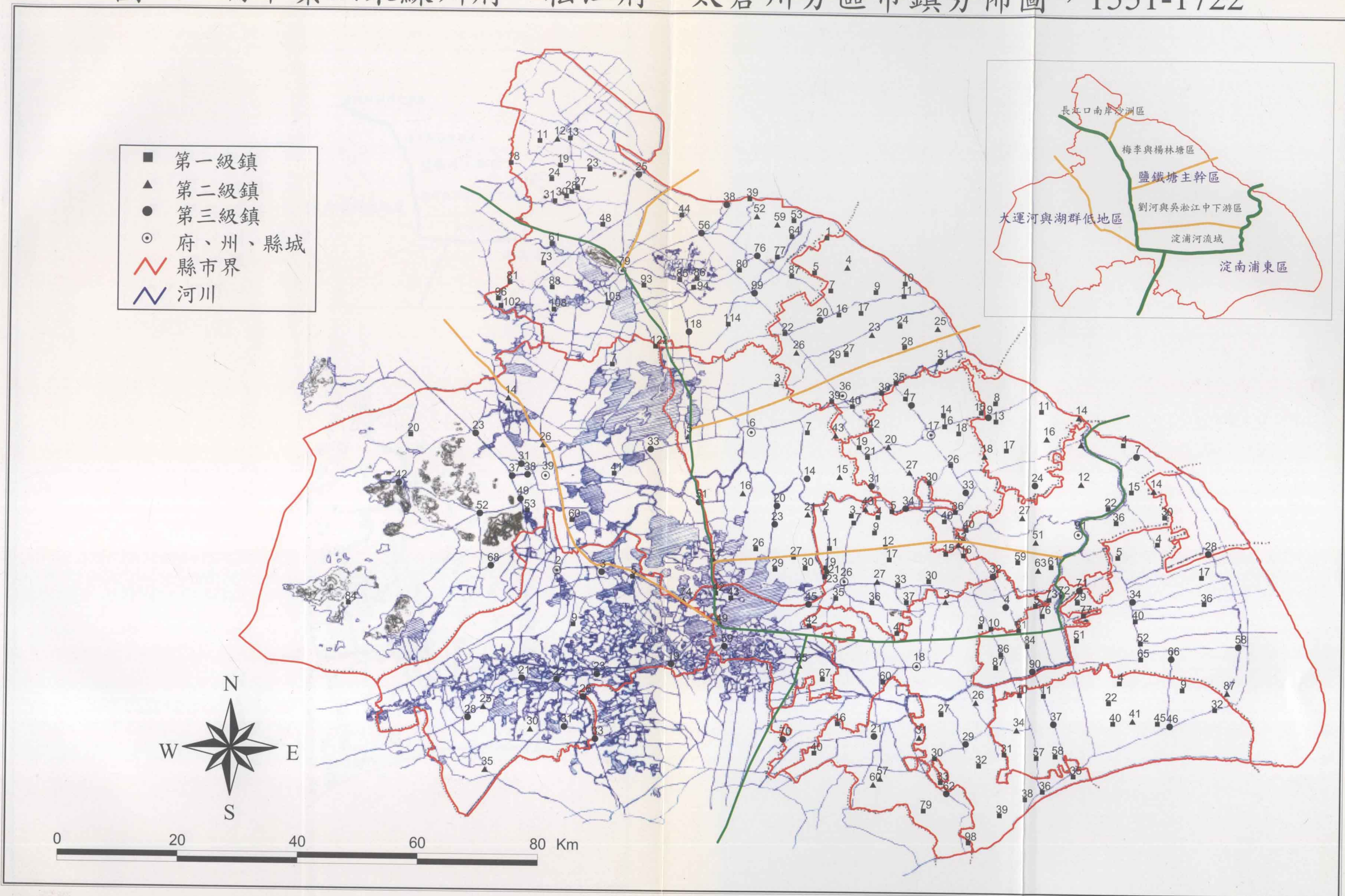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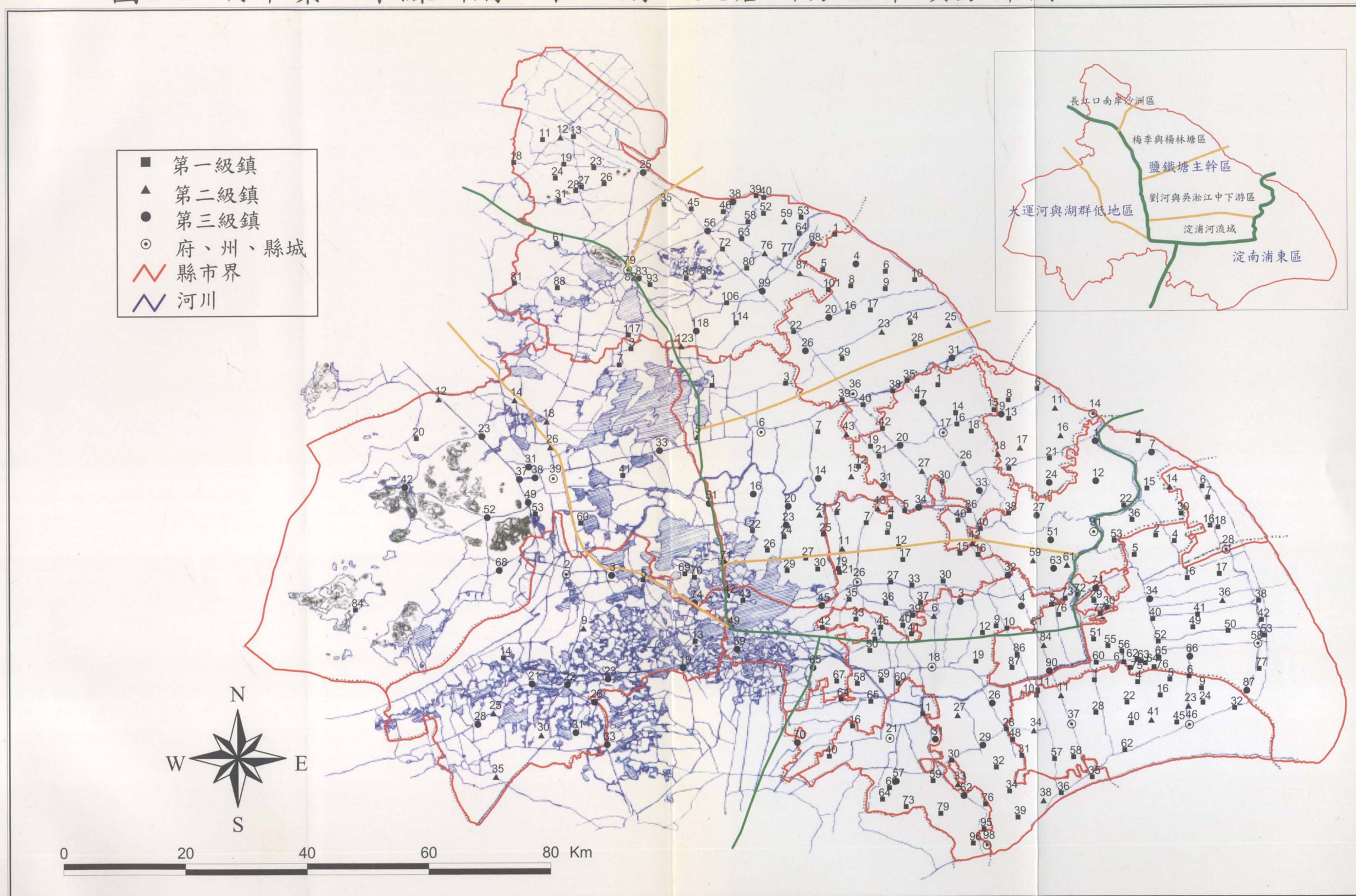


圖2-3 明中葉以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1723-1861



目 次

序 言	i
第一章 導論	1
第二章 市鎮與鹽鐵塘主幹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19
一 長江口南岸沙洲區	20
二 梅李與楊林塘區	25
三 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	45
四 淀浦河流域	94
第三章 市鎮與淀南浦東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113
第四章 市鎮和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147
一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東部	148
二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西部	161
第五章 結 論	205
參考文獻	211
一 傳統文獻與地方志書	211
二 近人論著	218

圖 表

表1-1 明清歷年常關稅收額表13

表2-1 長江口南岸沙洲區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21

表2-2 梅李與楊林塘區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26

表2-3 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46

表2-4 淀浦河流域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96

表2-5 鹽鐵塘主幹區市鎮數量與等級變化表111

表3-1 淀南浦東區市鎮名稱、數量與等級變化表114

表3-2 淀南浦東區市鎮數量與等級變化表146

表4-1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東部市鎮名稱、數量與等級變化表149

表4-2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西部市鎮名稱、數量與等級變化表162

表4-3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市鎮數量與等級變化表203

圖1-1 明清時期全國與蘇南地區重要的商路223

圖2-1 明中葉(1550年止)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
圖225

圖2-2 明中葉以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
1551-1722227

圖2-3 明中葉以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
1723-1861229

圖2-4 黃渡鎮圖73

圖2-5 黃渡境全圖74

圖2-6 吳淞南境水利圖75

圖2-7 南翔鎮圖80

圖2-8 江灣鄉圖85

圖2-9 珠里總圖102

圖4-1 康熙年間用直鎮圖154

圖4-2 乾隆年間用直鎮圖155

圖4-3	康熙年間甬直鎮形勢圖	156
圖4-4	乾隆年間甬直鎮形勢圖	157
圖4-5	嘉慶年間黎里鎮全圖	180
圖4-6	光緒年間黎里鎮全圖	181
圖4-7	周莊鎮全圖	184
圖4-8	周莊鎮圖	185
圖4-9	盛湖圖	196
圖4-10	盛澤鎮圖	197

第一章

導論

自1950年代中期以來，以探索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萌芽」議題為主，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在中國大陸史學界中曾蔚為相當活躍的一支顯學。流風所被，歐美、日本漢學界在這一領域中也多有所發揮。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中國境外就其涉及領域之廣泛與深入，尤其是對日後許多探索取向深具啓迪之功者，何炳棣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一書，堪稱是最重要的一部專著¹。至於中國國內，傅衣凌於1950年代中期出版的《明清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一書，其中所抒發的議論，也可以說是為日後整個大陸學界的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奠下了論域的基本範疇²。

儘管中外特別是中西學人之間，關於如何詮釋「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語詞的意涵，曾有過不同的見解，但就反映此一「萌芽」要素的具體現象而言，歷來根據中外學人特別是大陸學者廣泛發掘出來的史料，無論是從人口大量增長³、國內貿易流通量擴大、商品市場擴充⁴、商人與會館行

1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9)。

2 傅衣凌，《明清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 陳忠平，〈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察〉，《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1988.4: 89-96；賴惠敏，〈明清海寧查、陳兩家族人口的研究〉，《大陸雜誌》78.3/4(1989): 1-30；行龍，〈人口壓力與清中葉社會矛盾〉，《中國史研究》1992.4: 51-58；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台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92）；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

會公所之興起⁵、經濟作物廣泛種植以及官私手工業遞嬗等角度觀之⁶，

(續)

出版社，1997)。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李伯重，〈控制增長，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為〉，《新史學》5.3(1994)：25-71；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兩個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1)：31-37。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5卷、第6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 4 韓大成，〈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萌芽〉、黃佩瑾，〈關於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以上均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1-102、103-197；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傅衣凌，〈明末清初江南及東南沿海地區「富農經營」的初步考察〉，收入氏著，《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21-144；羅崙、景魁，《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4)；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方行、石奇、簡銳、汪士信，〈鴉片戰爭前主要商品市場估計說明〉，收入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18-329；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頁534-590；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的長程貿易與信用市場〉，中研院經濟所編，《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台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頁863-883；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蔣建平，《清代前期的米穀貿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陳春聲，《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李文治，〈論明清時代農民經濟商品率〉，《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1：21-42。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范金民、金文，〈明清時代江南絲綢的國內市場和對外貿易〉，收入氏著，《江南絲綢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頁236-300。
- 5 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36.1-4(1953)；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葉顯恩，〈試論徽州商人資本的形成和發展〉，收入《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358-381；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3)；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1996)。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頁11-99；呂作燮，〈論明清時期會館的性質和作用〉，收入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頁172-211；呂作燮，〈明清時期蘇州的會館和公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2)：10-24；汪士信，〈明清商人會館〉，《平準學刊》第3輯下冊(1986)，頁89-106；洪煥椿，〈明清蘇州地區的會館公所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收入氏著，《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566-612；王衛平，〈清代(康熙·光緒年間)江南都市 公所蘇州 中心〉，

中外學人對於總體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遠邁前代此一說法，殆皆無所置疑。進一步，這一水平在清乾嘉時期臻於鼎盛，西方學者或慣以 High Qing 稱之，也多被學界視若常識般的廣泛接受。

質言之，自1950年代以來，中外許多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的論著，儘管分析角度、詮釋內容，以及引證的資料各有不同，其中間或也引起一些激烈的論辯，如晚近美國黃宗智對明清華北與江南經濟提出內捲化 (involution) 觀點而引起的爭論等⁷。然而，所有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在明

(續)

《史學研究》210(1995): 20-43；王日根，《鄉土之鍊：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6 劉永成，〈試論清代蘇州手工業行會〉，《歷史研究》1959.11: 21-46。李龍潛，〈清代前期廣東採礦、冶鑄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學術研究》1979.5；趙岡，〈南宋至清末蘇州地區土地生產力之變化〉，《食貨復刊》12.9(1983): 321-324；汪士信，〈我國手工業行會的產生、性質及其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2(1981): 213-247；彭澤益，〈清代前期手工業的發展〉，收入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369-399；韋慶遠、魯素，〈論清初商辦礦業中資本主義萌芽未能茁壯成長的原因〉，《中國史研究》1982.4: 75-86；韋慶遠、魯素，〈清代前期的商辦礦業和資本主義萌芽〉，《清史論叢》1982.4: 65-91；石奇、方卓芬，〈清代前中期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方行、石奇、簡銳、汪士信，〈清代前中期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上)：江蘇浙江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蘇松棉布加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方卓芬、胡鐵文、簡銳、方行，〈清代前中期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皆收入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84-268、362-410、452-646；吳承明，〈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2: 63-77；范金民，〈明清時代蘇州絲織業生產形式和生產關係初探〉，收入洪煥椿等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84-219；彭澤益，〈從清代手工業所見佣工的雇佣習慣與形式〉，收入湯明燧、黃啓臣編，《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112-120；吳慧，〈清前期糧食的畝產量、人均占有量和勞動生產率〉，《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1: 43-48；徐建青，〈清代手工業中的合伙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4: 125-139。
- 7 參見R. Bin Wong,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A Note on the Myers-Huang Exchan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3(1992), pp.600-611；葉茂，〈對黃宗智中國經濟史研究之評議〉，《中國經濟史研究》4(1993)，140-142。

清社會經濟日趨繁盛這一前提下完成的。明清社會經濟較前代為發達固為事實，但對於這一前提的認知本身，或者如何進一步規範與定義這個前提，對學界而言似乎從來都不構成為一個問題。

晚近在中國大陸新刊的一些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專著中，儘管「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字眼仍不免會被提到，但顯然已遠不如早期「資本主義萌芽」論鼎盛時期那樣，幾乎像是被奉為主臬一般的言必稱引之⁸。尤有進者，還有少數研究者曾正面挑戰此一學說，而主張大幅修正或摒棄之⁹。不過，這些都還侷限於「資本主義萌芽」說有效解釋範圍的論辨而已；是就源諸於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資本主義模式，可否作為詮釋或規範明清社會經濟發展，所提出的一種思維概念上的質疑。另外從實質內容出發，具代表性者，有范金民和夏維中二位合作以及范金民個人分別在1990年代初期和末期發表的兩部專著¹⁰。二者在綜合運用大量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針對明清蘇州府和整個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進行廣泛的實證分析時，儘管其基本見解仍不外是肯定「資本主義萌芽」論所主張的明清社會經濟蓬勃發展這一現象，但對某些既有看法，字裡行間則隱然透露出其似有過度誇張之嫌，而持適度保留的態度。

然而，真正最難能可貴的，則是早在1985年當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尚方興未艾時，由許滌新、吳承明二位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表面上雖是就195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成果的總其成，實質上卻是對歷來基於「資本主義萌芽」觀點解釋明清的社會經濟狀況，做出了相當深刻的反省與修正¹¹。相較於過去

8 參見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上、下（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上、中、下（北京：經濟日報社，2000），各章節。

9 晚近大陸學者的有關這方面頗具深度的反省與批判性文字，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524-531。

10 范金民、夏維中，《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